



清末中日 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

吕顺长 著



商務印書館

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

吕顺长 著

商務印書館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吕顺长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中日文化交流新视域丛书)
ISBN 978-7-100-08454-3

I. ①清… II. ①吕… III. ①教育事业—文化交流—研究—中国、日本—清后期 IV. ①G529.52②G531.3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041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

吕顺长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8454-3

2012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 32.00 元



吕顺长，1962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康市。1995年7月获杭州大学“专门史”专业历史学硕士学位，2007年3月获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现任日本四天王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清末浙江与日本》、《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编著)等。

总序

在通常的学科分类目录中，“中日文化交流史”一般归入“专门史”门类，但其本质应当属于交叉学科，不仅其外延覆盖中国史和日本史，其内涵还涉及思想、宗教、法制、民俗乃至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人文社科的方方面面。

尽管作为一门学科地位尚不甚稳定，然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均有深厚的积淀。总体上说，日本起步较早，成果也颇丰硕；中国急起直追，点面均有突破。

日本方面的代表性成果，首推辻善之助的《增订海外交通史话》与木宫泰彦的《日华文化交流史》，虽都成书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但依然不失为经典，尤其木宫泰彦的著作经胡锡年汉译，成为众多中国学者案头必备之书；其次是森克己围绕“日宋贸易”的系列作品，即《日宋贸易之研究》、《续日宋贸易之研究》、《续续日宋贸易之研究》、《日宋文化交流之诸问题》，以网罗史料齐全见长；再则是田中健夫，成果集中于元明时代，如《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中世对外关系史》等，继承森克己学脉而多有创新。除此之外，实藤惠秀的中国留日学生、大庭修的中日书籍交流、池田温的中日法制交流、小曾户洋与真田柳的中日医学交流等研究，均有开拓之功。近十余年来，更呈群贤

辈出之势，如森公章、山内晋次、榎本涉、河野贵美子等，各有建树，令人刮目。

回观中国，在民国时期的抗战硝烟中，虽偶有吉光片羽的佳篇力作，如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等，但基调一直比较低迷；新中国成立后，硝烟已散，敌意未消，此门更趋凋零。迨及 20 世纪 70 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研究才渐成气候。

由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交叉学科特性，涉足该领域的学者也颇庞杂，除了日本学专家，专治国学各科专家也参与其中，依托各自学科领域的深厚功底，急起直追，以致短时间内后来居上，在局部点面屡出新意。

如在文学领域，严绍璦《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与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堪称珠联璧合，开创中日文学交流史新生面；在考古分野，王仲殊围绕“三角缘神兽镜”撰文著书，提出“东渡吴人制镜说”，震撼东瀛；于人物专题，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沈殿忠等《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拉近了与日本学界的距离；哲学思想方面，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日中儒学之比较》不拘旧说，创意间出；书籍交流方面，严绍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王勇等《中日“书籍之路”研究》等，文献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尤其架构“书籍之路”理论备受关注；古代史有汪向荣《古代的中国与日本》、王金林《奈良文化与唐文化》等，均有日文版问世；近代史有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等，颇得学界好评。此外，在港台地区，郑梁生的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高明士的隋唐东亚教育圈研究、谭汝谦的中日书籍互译研究等，均独树一帜，不可忽视。

如上所述，“中日文化交流史”涉及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日本虽然

起步较早，但论者多依据本国文献史料、立足于本国历史文化、拘囿于传统史学观念，所以涉及日本大抵考证精当，事关中国或多语焉不详。中国的情况则稍有不同，主要有两点：涉足此门的学者基本上精通日语，又能读懂艰涩的日本古代汉文史料，语言优势为其一；在吸收日本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发掘中国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对传统的学说或观点加以佐证或修正，继而提出新见解，史料优势乃其二。

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学界虽起步较晚，但近数十年来进步神速，在某些点甚至面，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前述许多学者的著作在日本出版发行，以及王仲殊获“福岡亚洲文化赏”、严绍璁获“山片蟠桃赏”、王晓平获“奈良万叶世界赏”、严安生获“大佛次郎赏”等日本重要学术奖项，说明该领域的中日学者，已经进入平等切磋的新阶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周一良、严绍璁、王勇联袂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卷本问世，该丛书由中日双方各20余位知名学者执笔，同时在日本发行日文版，该丛书荣膺“亚太出版商联合会”学术类图书金奖，堪称中日学者联手营造这块学术园地的结晶。

本丛书聚焦于“中日文化交流史”，既顺应上述国内外学术界的大趋势，也反映出各位作者归属的学术团队的小背景，在这里有必要作个交代，以助读者了解每部作品的来龙去脉。

在日本研究渐趋兴盛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本人在杭州大学创建了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在“专门史”学科点招收“中日文化交流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98年该中心随“四校合并”而改称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遂在“中国古代史”学科点招收“中日文化交流史”方向博士生；2004年本人因故调离浙江大学，8名博士生最后挂靠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完成学业。

1989年创建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际，我把研究重点定位在“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并以开放模式运作科研项目，广邀国内外同道合作攻关。这些成果大多汇入《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奈良平安时期的日中交流——以书籍之路为视点》、《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诸书，先后在国内外出版。

我在浙江大学培养的8名中日博士生，虽然各自的专攻年代不同、侧重的领域相异，但一个共同特点是注重文献史料。回忆陈年往事，每周举办“读书会”的情景历历在目。桌子上堆满各类字典及参考文献，然后一字一句注释中日文献的相关史料，这些虽然看似枯燥乏味，但因此打下比较坚实的文献学基础。看到日后这批学生从“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当年的辛劳也不再觉得苦涩。

自从2000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算来时光已经流逝了10个春秋，现在他（她）们大多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在国内外高校独当一面。虽天各一方，但学脉相承，学术上的交流愈趋频繁，擘画这套丛书可谓水到渠成。然以“新视域”括之，我想大概以下几条可作依据。

首先，本丛书纵向由隋唐及宋元再至明清，每个朝代均有专著，上下衔接，自成体系；横向则涵盖历史、宗教、文化、教育、贸易诸分野，展现文化交流之丰富多姿。

其次，作者均精通日语，对日本学者的成果细心咀嚼，经过吸收与扬弃，依托国学底蕴、立足中国史观，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见识。因此，这些著作即使放到日本学界，相信也不会逊色。

再则，作者都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文献学训练，对书中引用的大量中日古代汉文史料，不仅在断句、训字、释词诸方面用力颇勤，在文意的诠释、史料背景的推断上也有创见。

还有，整套丛书虽聚焦于“中日”，但作者视野多兼及东亚，在东亚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审视追踪中日文化交流的历程。从传统的文化双向交流研究，进化到区域文化环流研究，符合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

最后，各卷作者均有在日本长期留学或执教的经历，受到中日两国学术氛围的熏陶；而且，他们在攻读博士期间，辗转于“历史学”和“文献学”两个学科，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双重的学科背景来研究这个跨学科的主题，相信会有独到的发见。

本套丛书初拟八卷，即隋唐两卷、宋代一卷、元代一卷、明代一卷、清代两卷，虽然总体上由隋唐而明清，似乎串接成一部中日文化交流通史，然元明时代略显单薄；加之各卷的主题也未能一以贯之，如隋唐部分偏重于书籍与人物，宋元明部分围绕佛教，清代则以教育和贸易为主。我们这个团队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便是合作撰写断代的中日文化交流通史，届时或可弥补本丛书留下的缺憾。

这套丛书若能给读者传递“新视域”的些许愉悦，给“中日文化交流通史”领域吹入几丝新鲜气息，则所愿也。

王 勇

2010年11月30日

目录Contents

绪论	1
----------	---

上篇 对日教育考察之研究

第一章 对日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19
--------------------------	----

第一节 甲午战前的对日教育考察	20
-----------------------	----

第二节 甲午战后对日教育考察者主要类型	23
---------------------------	----

第三节 甲午战后对日教育考察主要考察记	33
---------------------------	----

第四节 日本教育考察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40
-----------------------------	----

第二章 湖南提学使吴庆坻的日本教育考察	45
---------------------------	----

第一节 吴庆坻履历及其日本教育考察的派遣经过	46
------------------------------	----

第二节 《日本东京各学校参观笔记》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49
----------------------------------	----

第三节 吴庆坻日本考察期间的家书及其史料价值	56
------------------------------	----

第三章 张大镛及程恩培的日本教育考察 …… 62

第一节 张大镛及其《东瀛各校纪略》和《日本武学兵队纪略》 …… 62

第二节 程恩培的日本之行 …… 69

第三节 对日考察与浙江学堂的兴办 …… 72

第四章 罗振玉对日教育的考察及其对日本近代教育的引进 …… 75

第一节 罗振玉早年在上海的活动 …… 76

第二节 对日教育考察与《扶桑两月记》 …… 80

第三节 《教育世界》的创办 …… 85

第四节 《教育世界》对日本近代教育的介绍 …… 93

第五节 《教育世界》日文翻译之特色 …… 98

第六节 罗振玉的学校教育实践 …… 102

第五章 赴日考察官绅之日本访书 …… 106

第一节 清代日籍西渐的主要载体 …… 107

第二节 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日本访书记录 …… 111

第三节 清末赴日考察官绅日本访书之特点 …… 120

中篇 留日学生之研究

第六章 留日学生监督处《官报》及其史料价值 …… 125

第一节 清末留日学生监督处成立经过 …… 125

第二节 《官报》体例及刊行经过 …… 130

第三节 《官报》的收藏及利用状况 133

第四节 《官报》的史料价值 136

第七章 从《官报》看“五校特约”留学计划的成立过程及其实施状况 143

第一节 “五校特约”留学计划形成的背景 143

第二节 “五校特约”留学计划形成过程及内容 148

第三节 “五校特约”留学计划的实施状况 154

第四节 “五校特约”留学计划对浙江省的影响 160

第八章 浙江早期留日学生 166

第一节 近代中国最早的地方官费留日学生 167

第二节 1898 年的浙江留日学生 185

第三节 浙江早期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 201

第四节 浙江早期留日学生监督孙淦事迹 212

第九章 浙江留日学生的人数及其构成 224

第一节 浙江留日学生人数 224

第二节 浙江留日学生的生源组成和地区分布 233

第三节 浙江留日学生的学校和专业分布 236

第十章 浙江留日学生与教育事业 243

第一节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244

第二节 浙江官立法政学堂及浙江私立法政学堂 251

第三节	浙江医学专门学校	254
第四节	其他学校	257
第五节	教育行政岗位上的浙江留日学生	259

第十一章 浙江籍留日学生俞大纯的出身及归国后的活动

263

第一节	俞大纯出身考略	264
第二节	留学海外及参与革命活动	272
第三节	东北实地调查	275
第四节	晚年的活动及遇刺身亡	280

第十二章 关于留日学生的“反日”和“亲日”

287

第一节	“反日”的缘由	288
第二节	“文化亲日”与“政治亲日”	291
第三节	“政治亲日”的原因	296
第四节	《王克敏等人简历》中所见的华北伪政府中的留日学生	303

下篇 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之研究

第十三章 高田早苗的中国教育考察及其中国教育认识

311

第一节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开设和高田的中国教育考察	313
第二节	高田早苗早期有关中国的论说	317
第三节	高田早苗所见的中国教育现状	319
第四节	高田早苗的“共同利益论”及其本质	324

第十四章 明治末期日本人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认识 331

第一节 “血与泪之结晶” 331

第二节 “共同利益之所在” 335

第三节 “培植势力之长计” 336

第四节 “豚尾奴”与“佳宾珍客” 341

第十五章 从“人类馆”事件看明治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 347

第一节 大阪博览会与“人类馆”事件 348

第二节 “人类馆”中国人被展出事件 350

第三节 “人类馆”台湾女子被展出事件 355

第四节 “人类馆”事件所反映出的日本人的中国认识 359

第十六章 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国民性 364

第一节 高濂敏德等人的中国旅行及相关著述 365

第二节 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国民性 368

第三节 日本人议论中国国民性之背景 376

第四节 中日两国对中国国民性议论之比较 385

征引、参考文献 390

后记 400

绪论

一

提及近现代中日关系，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两国间所发生的一次次战争。近代以来日本所发动的这些侵略战争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更使中国人的心灵蒙受了巨大创伤，这是中国人永远难以忘记的，也是不能忘记的。但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的间隙，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的十余年间，中日两国间也有过许多的交流与合作，这虽然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却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在清末，无论是“戊戌变法”前后开始掀起的学习日本热潮，还是“新政”期间推出的诸多学习日本的具体措施，都是中国在被动的处境下主动作出的历史选择。中国人以惊人的勇气和现实的态度，抛弃妄自尊大的民族文化心态，通过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和教育考察官绅、翻译日本书籍等途径，向古来之“弟子”、甲午之劲敌学习，希望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可以说，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日本起到了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对近代日本而言，中国始终是其最为关注的目标。从明治初的武

力侵台，到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日俄战争，直至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始终是其最重要的侵略目标。在此背景下所展开的种种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明显具有服务于侵略目标之性质，即日本试图通过参与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从中国攫取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也不可否认，即使是在日本接连对中国发动战争期间，也有不少日本人并没有部分文人学者和政治家们的那种“深谋远虑”，而仅仅是以一种朴素的心态，看待或参与中日两国间的各种交流事业的。

在战争过后的日本，虽然多数人都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作了深刻的反省，但直至今今仍有不少人认为给中国带来灾难的那些战争是所谓的正义战争，这是极为可悲的。侵略战争绝不能美化，“正义战争论”更是无稽之谈。而作为被侵略国的中国，能正视近代以来与日本交往的历史，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

中日两国的交往，最早大致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两千多年来，两国间无论在人员方面，还是在物质精神文化方面，都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往来，对促进两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可以说两千余年的中日交流史，是两国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历史。但是，这种双向的影响和促进并不是在各个时代都以均等的比重进行的。在古代，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势位差，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促进，无论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还是在内涵和深度上，均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当历史行进到近代，两国间文化交流的这一关系逐渐

发生了逆转。若将中日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的这一关系比作师生关系，古代和近代两者所处的位置恰好相反。虽然老师并不意味着万能，学生也非一无所长，但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则无疑是主要的。

在 17—19 世纪，日本德川幕府和中国清朝政府不谋而合地实行“锁国”和“闭关”政策，其结果是闭目塞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国家逐渐走向衰退。然而，进入 19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渐，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迫使两国不得不进行历史性的选择。

1854 年 3 月，日本与美国遣日特派使节培里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宣告锁国时代的结束。1868 年，事实上统治日本长达 260 余年的德川幕府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明治新政府，日本历史自此从近世迈入近代。在明治时代，“一切效仿欧美各国现行制度”成了日本政府推行改革的基本方针。在此背景下，日本通过不遗余力地汲取西方近代科技文化而开始大步走向世界。

清朝政府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四邻诸邦为“蛮夷戎狄”。然而，自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我国门后，部分国人才渐感“外夷”乃非我邦所轻易能敌。诚如李鸿章所言：“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1] 为求存图强，除通过培养近代化人才，致力于汲取西方近代文明，以推进中国近代化之外，别无更佳捷径。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清朝官吏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新式船炮，抵御外敌的侵略；洋务官僚们也主张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应用技术。然而事与愿违，甲午一役，中国竟惨败给“蕞尔小国”

[1] 吴汝纶：《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文海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6 页。